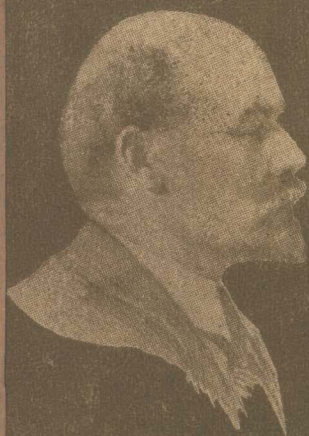




列寧家書集

徐 懋 庸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列寧家書集

徐懋庸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30·Q258·32K·P504·\$16.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二版

世界書局印刷廠承印

上海造 5001—10000 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二 十 九 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 京 王 府 井 上 海 南 京 路 瀋 陽 太 原 街 廣 州 永 漢 路

天 津 濟 南 西 安 長 沙 開 封

香 港 大 連 哈 爾 濱 重 慶 漢 口

目 次

序 文

I “人”的列寧	1
II 職業的革命者	22
III 政治家的列寧	36
VI 理論家的列寧	62
V 哲學家的列寧	82

第一輯

引 言	107
彼得堡的初期(1894—96年)	111

第二輯

引 言	139
在西伯利亞的流放中(1897—1900年)	145

第三輯

引 言	313
第一次流浪時期(慕尼黑·倫敦·日內瓦, 1900—05年)	325

第 四 輯

引 言..... 351

第二次流浪時期(日內瓦·巴黎·Cracovie, 1935—14年)• 359

第 五 輯

引 言..... 459

歐洲大戰時在瑞士(1914—17年)• 465

序 言

I “人”的列寧

這裏的許多信，是 1893 到 1917 年間，列寧從俄國，從西伯利亞或從外國寄給他的母親和他的姊妹們的書信的一部分。

在這許多年中，——差不多佔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列寧是在陰影之中，至少在半陰影之中，盡心竭力，準備着現代的最偉大的一個變動。寫這些信的這人，在他寫這些信的日子裏，未嘗稍停地做着一場有計劃的世變的實際的指導者，煽動者和實現者；這場世變，在地球上的資本主義的渾沌中，打下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改變

了世界的面目，改變了 1917 年 10 月以後的歷史。

有的人會說：名人們的私信，通常總要使其人的偉大性減色。人們愛從這種反映一時一刻的思想的瑣屑的手札之中，去看他們怎樣恢復其本來面目。讀了私信，人們就會理解一個偉人的“小”的方面，而這對於人們是不值注意，沒有教益的。……然而，這裏的情形卻不同。在那種著名的淺薄者的標本，即所謂“表面的觀察者”的眼中，纔認為列寧在這些信中是游離了他的政治工作的，但這只是一種浮淺的，錯誤的看法。從這個問候着家人的起居，要求着寄給書籍，而且報告着他的個人生活的概況的人的身上，我們實在看出了一個無論何時，都不至於而且不能停止地，化身為“革命”的 Titan（巨人）來。這些書信，也許較之這個現代史上巨人的別的任何手稿，更能使我們看出其人跟他的事業的相互滲透和完全一致來。

但這是他的歷史人格的一部分，他的戰鬪活動的一方面，——他的作為“職業的革命者”的工作中的戰鬪活動，特別是在這些信件中，早就給人預料到，猜測到的。

簡單地先說一說這個人物。

烏拉第米爾·伊里奇·烏里央諾夫（Vladimir Ilitch Oulianov）是在 1870 年的 4 月 22 日，生於伏爾加河（Volga）中段的流域的 Simbirsk 地方的。他的父親 Ilia（Ili-

teh 就是 Ilia 之子的意思)是初等學校的督學官。他的母親 Maria Alexandrovna Blank, 是行醫的一個鄉村小貴族的女兒,在 Kazan 邦中,轄管着一處小小的產業。

烏拉第米爾是次子。他的哥哥,亞歷山大 (Alexandre), 一個化學技師,是一個 Narodnik (民粹主義者),換句話說,他是當時的革命的恐怖主義者的黨派中的一員,這種革命的恐怖主義者,就是被法國人誤稱為 Nihilistes (虛無主義者們)的,他們憧憬着農民革命,以為這種革命是非在資本主義破壞農村公社——這在他們是叫做未來的“俄國社會主義”的核心的——以前爆發不可。他們有着理論家,也有着組織,但以謀殺為行動。1881 年沙皇 Alexandre II 被 Narodniki 們所暗殺的事件,引起了嚴重的壓迫。在 1887 年,有一個對付 Alexandre III 的陰謀,這是 Narodniki 們最後一次公開行動的大計畫。這次陰謀是被警察所破獲了;主謀者都被審判,上了絞架;Alexandre Ilitch 也在其中。其時烏拉第米爾有了十七歲,他已經在跟 Narodniki 們所走的相異的道路上,——在卡爾·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熱心於政治活動。

1887 年,烏拉第米爾·伊里奇考入 Kazan 大學,卻就在同年被開除(因為他加入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

秘密組織)。他被驅逐到他的外祖父的領地去，在這地方，他的姊姊 Anna (Elisarov 之妻)，先被沙皇的勢力所放逐了。不久之後，他加入了 Samara 的律師公會，做了一年的律師。

若干革命者，如 Plékhanov, Axelrod, Véra Zassoulitch, 和別的幾個——一小羣的戰士——組織了勞動自由社，這就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果核。在 Kazan 的時候，以及 1892 年在 Samara 的時候，烏拉第米爾·伊里奇都參加着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

從這時起，他的生活，就跟俄國的革命運動不可須臾分離了，並且，憑着一種從頭就顯得非凡的魄力，和一種異常的活躍，他繼續地進行種種偉大的事業——這些事業，可以這樣概括地說：“戰鬪”。先是爲着馬克思主義，而反對那 Narodniki 們底不正確的理想和無政府主義的手段；後來又反對那使勞動者的鬭爭離開社會鬭爭而僅僅局限於職業上的利益的追求的，非政治的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apolitique)；最後，又爲着一個真正革命的布爾塞維克黨的創建，而和孟塞維克底改良主義的，投降的，——而且雖然打着“Démocratique”（“民主的”）的標幟卻並無實效的歪曲傾向而戰鬪。

我們在這裏所公佈的這些信，是配合着，從這些大戰

關的時代起，至1917年二月革命為止的一大階段的。列寧的這些信的主要收受者是他的母親 Maria Alexandrovna 和他的姊妹 Maria (Maniatchka) 及 Anna Ilinichna。此外和他的姊姊 Olga 也有關係；這個姊姊，是當她做醫學生的時候（1891 年春），因為看護病人和她的也是青年謝世的兄弟 Dmitri (Mitia) 之故，傳染了傷寒症而早就死去的。

我們將在後面讀到的書信集，是並不完全的。這些信件，只有一部分尚被保留着。收受這些信的人們，都是處在各種不斷的迫害之下的，既然他們是 Okhrana——沙皇的祕密警察——所永不忽視的一個革命戰士的至親，何況他們自己也就是戰士。他們的私生活是充滿着匆忙的搬家，搜查，被捕或流放的痕迹的。因此，他們的闖禍的兄弟所寄給他們的許多信件之缺失，實在毫不足奇，有的是落在偵探的手裏去了，有的是被那些怕招災惹禍的人們所燒毀了。有着上述的命運的信件，自然是“最有興味的”一些：是用了不顯形的墨水，寫在某種旅館帳單或詩稿的反面的“化學信”，或者是用同樣的方法，嵌寫在書本或科學雜誌的字裏行間的。關於這事，列寧的姊妹 Elisa-rova 夫人 (Anna Ilinichna) 告訴過我們，1901 和 1902 年間，當她在巴黎跟她的兄弟住在一起的時候，她怎樣的學會一種特殊技能，就是靠着手摸就能選定那種有着最適

於記錄密字的紙張的書籍。巴黎的舊書舖老闆，看着他們的這位主顧對於她所買的內容古怪的舊書的紙張表現着特殊的興味，始終莫明其妙，只是大為驚詫而已。

最後，有一部分信件，是永遠到不了收信人的手裏的，那是經過檢查員的手，並且爲他們所特別注意的一些。許多的信，是大轉彎地旅行的，往往得通過三四個中間人。它們經過許多的關口，每一次總逃不過雙重的檢查：“在我們的處境之中（在你的，尤其是我的境況中），要稱心如意地通一次信是十分困難的。”列寧在給他姊姊 Maria 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這對於別的通信者，連他的老母在內，顯然也是一樣的。

從這一切限制和追逐之下存留下來的信件，保留着它們被寫下的時候的種種困難的情形的印記。發信者需要時時刻刻注意這事情，就是他所寫的這幾行文字是要被祕密警察們小心地，戀戀不捨地閱讀，研究，分析過的。他又得估計到他的通信者的方面，若沒有一種雙重的眼光，至少須有一種特殊的敏悟。在許多封信中，我們常常碰到十分奇怪的語氣，最曖昧的切口，意外的和例外的固有名詞。列寧在一封信中間起一個“旅行中國的人”怎麼樣了——其實是探詢着他的少年時代的朋友，又是 Samara 團體中的同志的 A. Sklarenko 的狀況，這人當時正

在滿洲的鐵路上當差使。當他請人轉達他的最大的願望“於波蘭的朋友們”並且希望得到他們的消息時，其實是要知道他的朋友 Vorovski 的近況（這人後來是在瑞士，被 Conradi 所暗殺的。）。

同樣的祕密的言語，也用在關於文學，科學，政治的參考書的問題上，這種種參考書，是列寧在信中時常說到的。Maria Oulianova 就這樣的情形之下，把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宣言”的樣本，夾在照片簿的簿面之中，寄給她那住在 Munich 的兄弟。列寧接到了這種於他十分重要的參考資料之後，用這樣的話答覆道：“承維也納的表兄帶到了各種書籍。尤其是許多非常美麗有趣的照片，感謝之至。我希望時常能夠得到同樣貴重的贈品。”所謂“維也納的表兄”，其實是 G. Krassine，他就是把那本照片簿放在小皮箱裏從維也納帶到 Munich 的。

這樣地，這些信件相當地能夠把讀者引導到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底祕密的和特殊的狀態裏去——這個人，就是以他的十年的堅韌的活動，促成了俄羅斯帝國的崩潰而代之以一個新的，紀念碑的社會的。

這些通信，雖然本質上是政治性的，而且爲了“陰謀上”的必要，是頗有刪削的，但是，通過了它們的偽裝，我們同樣地看得出那個“人”。在革命的動亂的初年裏，關於

列寧，人們有什麼話不會寫過啊！他的敵人，連那些混入“朋友”範圍的人們也在內，競以製造可笑的謠言爲勝。至於公然地真面目地以惡意相對的人們，則把他描寫成一個好殺的劊子手。有些後來加入了反革命陣營的或真或假的“同人”，把他說成一個心地狹隘的政客和牢騷的憤世家。另一些人，則把他形容成一個常發怨聲的不信託人的小布爾喬亞。但是，透露在他的書信的字裏行間的這個“人的列寧”的真相，跟上述種種可悲或可笑的漫畫，多麼地不同啊！

在這些信件所包含的，那醞釀着決定的革命的整個時期裏，我們看出，俄國各地的沙皇勢力所追逐所搜索着的敵人，是深切地掛念着他的家屬的命運的。對於母親，他尤其關心。他和她的關係上，是尊重，恭敬和一種可以說是天性之愛混合着的。我們不斷地看到，這遠離膝下的兒子，常常勸告他的母親，叫她住在這裏或那裏，叫她怎樣安排她的居處，使這做了兒女們的命運的奴隸的老婦人，時常得更動住址。他勸她少跑跑路，多休息休息，要保重身體。當不知道她所住的屋子是否够溫暖時，就很不安，於是告訴她應該在房間裏裝一個小小的鐵火爐，“像此間所用的那種——他寫這信時是在巴黎——或者像我們在西伯利亞時所用過的那一種。”這位老 Maria Ale-

xandrovna 的生活——當她的兒子初次長期流寓在外國時，她已有七十多歲了——實在是不大容易的。一個接着一個的，她的兒女們（她的長子，是好幾年前就被絞死了的）：兒子，女兒，女婿，都被逮捕，被監禁，被處罰，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遠方的治下。在許多年的長時期內，她只孤另另地一個人生活着。已是別的老婦人們正好安樂地在繞膝的兒孫羣中享受清福的年齡，她卻要時常坐在監獄官的應接室裏，等候跟她的兒女們之一見一見面，或者孤單地抵抗那“嫌疑犯”的生活的困難，接二連三地，這個被捕了，那個起解了，對於各人的命運的憂慮，更增加了她的痛苦。她一生中最慘苦的時候，要算是1901年了：Volodia（烏拉第米爾的愛稱）被流放，女兒 Maria 和女婿 Elisarov 下獄，女兒 Anna，爲了逃避同樣的命運而躲在外國，幼子 Dimitri 被驅逐到外省的一個小小的大學城裏，不准入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之境。

這時的數月間，母親寫給她的兒子的信件，並沒有保留下來（烏拉第米爾·伊里奇——也像他的同志們和家屬們——是遵從着共同的規定，不得保留“私”信的）。歐洲的民主政府或立憲政府，都把這個危險的“Nihiliste”（虛無黨員）的姓名，登在他們的黑表的主要地位，他若一不小心，就會貽害於整個組織的（在他，世上是沒有比

組織更貴重的事物的)。在 Volodia 答覆他的母親的信裏面，我們可以看出，母親對於那些紛紛離散的親人們的命運，是表示着極深的不安的。在那些回信裏，則洋溢着對於母心的悲痛的憂念的一種深切的同情。當時的列寧的生活，從精神的觀點看來，可說是豐富而開展的，但從物質的觀點看來，則困苦而艱難。這是他從西伯利亞歸來之後，馬上就接下去的第一個流放時期；他當時對於這次的流徙尚未習慣，況且他首先所到的地方慕尼黑使他感覺缺乏許多東西，不像那些聚集成殖民地的移民那樣的來得容易生活。不過，就在這個時期，他的頭腦之中，準備好了他的爲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而作的大鬭爭底決定的階段之一；也在這個時期，他開始組織起未來的布爾塞維克的鐵軍來；也在這個時期，他想好了“職業的革命者們”的組織，這就是他從 1901 年的秋天開始寫作的做什麼？一書中所解釋着的；跟他的實際的生活平行地，他在歷史上活動起來了。他的夫人，Nadejda Constantinovna Kroupskaia，他的流亡中的伴侶，記着他在這時期的情形道：“當他寫作的時候，我從不對他說一句話，絕不問他一聲。”雖在這種完全集中於腦中所想，手中所寫，而且深知其重要性（這種地方，他是超過一切別的同志們的）的政治問題上的生活中，他卻總騰得出時間和言語去安慰他

的老母。他時常努力想像許多新的證據，使她覺得境況似乎比較好了一點，他對她說些別的“情形”，如說許多因極重大的事件而被捕獲被控訴的犯人已獲釋放了。終於有一天，這個困苦地來來往往，被反動者攆得飄泊不定的七十老婦，停止了她的絕望了，在廣大的俄羅斯土地上，在那二十年後豎遍着她的兒子的雕像和紀念碑，響澈着他的神聖的名字的大陸上。··

有好幾次，他想把他的母親留住在自己身邊，安慰安慰她的晚景。而成功的只有一次，但是阻梗他的這種主意的實現的倒是 Maria Alexandrovna 自己：她常常願意留在那些特別需要她的幫助的孩子的身邊。至於 Volodia，她知道他是“能幹”的，而且她又知道，他的身邊，另外有個女人在着，這人，一面作為他的政治工作上的最好的合作者，同時也對於他的辛苦的流動的移民生活，熱心地提供着一些德國人所謂“Gemütlichkeit”（安慰）的東西。

關於 Nadejda Constantinovna Kroupskaia——她是從 1894 年起（這年，列寧在聖彼得堡的社會民主黨所組織的工人教育團體中，認識了這個年青而熱烈的女戰士）到這偉大的領袖之死（1924）為止，一直共着革命者的生活，而且給我們寫過一冊動人的列寧回憶錄的，——在書信中提供着一個很生動印象。那在活潑的羣衆和勞動

階級當中生了根的列寧，當他無論在何處出現的時候，雖然他的頭顱是偉大得達於絕頂 (Stratosphère)，但是我們總能識別出他的夫人的忠實和相似，而且其偉大不亞於他的影子。但是我們不要太相信“影子”這個字眼。使我們覺得她不過如此的，那是由 Kroupskaia 的謙遜，她這謙遜可以說是“過度”的。實際上，布爾塞維克黨，俄國的革命，對於這個非常的婦人，是應該致很大的敬意和一種對創造新世界的人們所應有的感謝的。那些決定着這兩個人物的關係的全部的連繫，深密的結合，使我們想到：在有些情形之下，在列寧的書信的一旁，有轉載 Nadejda Constantinovna 寫給同一個收信人的信件的必要。這是一件特別有趣的事，看一看許多同樣的事實，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心事，怎樣地以一種稍稍不同的方式，反映在這兩個人的才能上和性格上。

列寧的性質就在這種地方表現着。他對他的一生的伴侶所保持着的不移的愛情，在“大人物”中間，無疑地可說是一個稀有的現象；至在一個常因外力而不測地變動不定的職業的革命者的生活中，則是特別可驚異的現象。假如，在這極簡略的敘述中，容許我們拉長一下，考察考察他們的這種關係，那麼我們可以舉他們一對，為一男一女的結合的好例子，差不多可以說是最美滿的：兩個人，